

读史阅世

读史谈届

飞鸾岭茶碑中的坦洋茶事

□江振鹏 郑彦凌 文/图

宁德飞鸾岭南路的起步岭,保存着两块清光绪时期的石碑,碑首均镌有“起步岭碑”四字。其左侧碑文304字,记录了光绪五年(1879年)宁德、福安、寿宁等地的茶商共同募捐以重修茶路的数目。其右侧碑文共442字,记述其时起步岭地区茶道修建的始末与茶商捐款的数目。起步岭碑是闽东名茶“坦洋工夫”发展壮大、远销海外的见证,重现了晚清时期海丝茶路的兴盛。

“罗源北关外有起步岭,泛原九达,径转千盘,岩峻而凌,鸟道之烟,屈曲而入羊肠之阪。”起步岭(今亦称梅岭),顾名思义是罗源出城的第一条岭,位于罗源与宁德的交界处,是罗源古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福建北路茶运输的必由之地。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格规定仅限广州一口通商,又屡次下令严禁茶叶海运,福建茶叶多通过内河转运至广州或恰克图。《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厦门被迫开埠,闽茶改为省内输出。彼时闽茶以地域划分为三类:南路茶、北路茶与西路茶。南路茶以安溪附近所产制的乌龙茶为代表;西路茶以武夷茶为代表,久负盛名于海内外,但山岭崎岖,交通闭塞,转运困难;由福州北岭到福宁所属的福鼎、宁德、霞浦、福安、寿宁、罗源、古田及屏南等县为北路,其所产之茶,虽因制造不得法与气候土质之关系,品质稍逊于西路茶,但“北路之茶为建宁茶客所赏识,于福安县北坦洋采制工夫,其制茶法遂传入北路,因滨海交通便利之故,转占输出优越地位”。

近代北路茶的代表“坦洋工夫”约于清咸丰年间创制。咸丰二年(1852年)后,福州茶务始盛,输出量飙升,成为仅次于汉口的茶叶输出地。1853年有14艘船到达福州港,运输茶叶出口;1854年,福州装运茶叶出口的船舶增加到55艘,出口量达13万担;1855年,茶叶出口量增加到27万担;1856年已有148艘船,出口茶叶数额也跃至37万多担。

清同治四年(1865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提及运至福州港口的茶叶,仅少量销往中国口岸,绝大多数直接用轮船出口外国。福州茶港兴盛之际,量大质优的“坦洋工夫”远销英国、荷兰等国,以鲜、醇、清、甘的口味,契合了欧洲人对红茶的旺盛需求,其一经面世,即深受西欧市场与欧洲皇室的青睐。宁德飞鸾岭南路起步岭,就是“坦洋工夫”向福州陆



起步岭碑

运的必经之路,也是其以自身独特魅力征服西方世界的见证。

起步岭地区的茶路,此前崎岖难行,多有崩塌之处。光绪年间,地方绅董李世镐、胡兆江、王正卿、吴步森,以及茶庄“和记、万利、仁记、兴记”等共同倡议重修。其时,坦洋村成为闽东的一大茶品集散地,慕名而来做茶生意的茶商络绎不绝。除原有坦洋村的施、胡两姓外,还有王、吴、郭、李等,其中论茶庄规模、经营时间,当数胡、施、王、吴四家族最盛。

胡姓最成功的茶商是胡大盛、胡兆江。坦洋胡氏耕读为本,农商兼营,自明末即事茶,开垦茶园,培育新茶种。胡大盛经营茶业,不畏挫折,率先试制工夫红茶成功。胡兆江是“坦洋工夫”创始人之一,经商闲暇时读

书不倦,平日待人接物,温若春煦。其热心公益,时人赞扬胡兆江“不为士之业,而为贾之良”。施姓以施光凌、施福隆最为闻名。施光凌一生乐善好施,为无家可归的乞丐“架瓦屋数间以庇之”,甚至对伪造其商号银票的不法之徒也概然不予计较。施福隆曾任福安茶厂总评审师,其严谨认真的事茶态度,一时被誉为茶界美谈。

王、吴两家人行时间虽晚,但所经营的茶庄诚信守义,几代茶人才智过人,善于经营,为“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发展作出贡献。社会风气崇尚奢侈之时,王正卿仍简朴传统,并教育子孙“不得稍耽安逸,染靡习”。吴步云发迹后依然勤约治家,并思恩图报、关注国运。四家族各有多个茶庄,胡兆江经营“泰大来”,施光凌经营有“丰泰隆”商号,王正卿与吴步云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合作经营,共创“祥生记”茶庄,后分开经营,分掌“祥记”与“生记”。

起步岭碑文记录有修建起步岭茶道的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的商号及各自捐番数目。胡兆江、王正卿、吴步森等人号召茶人募款,丰泰隆、泰大来、祥记、生记、源胜隆等数十个商号响应,以茶庄之名起步岭捐番。据史料记载,“坦洋工夫”诞生后,福安市茶行林立,鼎盛时期,仅坦洋一条街就有茶行三四十家。光绪五年(1879年),由省委员督办在社口镇坦洋村设立茶类课,是闽东最早实行征收茶税的地区。

起步岭右侧碑文以246字,记录了飞鸾起步岭茶路烦琐复杂的修缮过程。光绪年间,闽红新秀“坦洋工夫”兴起,福安和周边各山县的毛青茶汇集坦洋,精制成工夫茶出口,茶叶运输量俱增,北路茶得以迅猛发展。北路茶运输途径多样,早期闽东海丝茶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全程水路,成品茶先用溪船运至赛岐,再从赛岐码头过驳大船运往福州马尾口岸,因工夫红茶主要用于外销,以赛岐为起点的海上茶路由此形成;另一条则是水陆兼程,出赛江最南端的白马门后,先到宁德飞鸾码头登岸,然后改用人力肩挑,翻越飞鸾岭,循古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

然而,北路茶运输陆路不及海路顺畅,道路崎岖不堪,途中荒芜之处众多,茶叶千担需以人力肩挑,翻越过程中本就多有艰险,更不

必提倡有山匪骚扰作乱。“以蚕丛未辟,行路艰难,马足不前,征途险阻。而樵荒力,力孰绍乎丁开,磴道崎岖,足然穷乎口步。五里十里顿嗒滑滑之泥,长程短程莫莫劳劳之驾。”石刻载有“罗源北关外有起步岭,泛原九达,径转千盘,岩峻而凌,鸟道之烟,屈曲而入羊肠之阪。自起步大岭以至飞鸾四十里,甚多崩塌,不啻同侪,亿万众之欢缘,长垂载道”。以募捐的方式积攒善款,共同修建中断的起步岭茶路,以资促进闽茶外销。

海外市场对“坦洋工夫”的需求量日益提升。为提升茶叶贸易利润,闽北茶商意识到,畅通“坦洋工夫”经由起步岭输往福州港口之茶路,举足轻重,刻不容缓,故“兹经公议,远近募捐,重加修理,易土而石,改险为夷。数千金之费,不吝同侪,亿万众之欢缘,长垂载道”。以募捐的方式积攒善款,共同修建中断的起步岭茶路,以资促进闽茶外销。

起步岭一带贯通后,众人喜不自胜,自信倍增,“从此涂铺砥,行踏琳琅,周道宽如砥之平,叠嶂若缘梯而上。扶仰着履,道遥视为坦途,踽踽坦途,劳瘁不惊隘道”。茶路漫漫,以捐募之财与三地茶商之力进行补葺,虽已大致打通艰险地带,但后续所现缺漏地区还需逐步修整,以兴闽茶。闽北茶人也在起步岭碑文中留下了对后人的希冀:“然善作固贵善成,能创尤须能整,倘后继者补之使完,敬者扶之使正,更于后起有望焉。”

值得注意的是,起步岭左右碑文中写有的各商号募捐款数均以“番”作为单位。西班牙银元与墨西哥鹰洋的大量流入,是“坦洋工夫”畅销海外、茶商积累国际通货的自然结果,亦是我国沿海地区与欧美贸易密切往来的历史见证。

“坦洋工夫”的繁盛开创了闽东红茶的新纪元,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中国制造”。它带动了坦洋村的商业和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从海外寄来的信件只需将“中国坦洋”写于信封,就能被准确送至收信人手中。

1899年,闽三都澳港口开埠后,“坦洋工夫”借机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出口量与年俱增。快速发展之下,传统水陆兼程、人力肩挑的运茶方式已无法负担巨额的茶叶出口需求,且福安至宁德三都澳港口距离不过咫尺,北路茶翻越起步岭至福州港口的模式因而逐渐被废弃。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尤溪县名考

□纪优梓

尤溪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建县,最大的历史疑案便是县名。“沈溪”是尤溪的别称,还是旧名?“沈溪”之名从何而来?县名是先“尤溪”,还是先“沈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尤川说。尤溪到宋庆历年间方有县志。明嘉靖六年(1527年)版《尤溪县志》载:“宋咸,宋咸(宋)庆历年(1041年)知尤溪……退食辑《尤川志》。”《尤川志》是尤溪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县志,但该县志在明代散佚。为何将尤溪称作“尤川”,并且把它作为县志的名称?原因不得而知。

南宋理学家朱熹写给友人的信件中,经常把尤溪称为“坦洋工夫”,如《与林择之书》云:“闻学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学者,不无恨于去耳。”“择之已辞尤川耶?彼学中今复何人料理?”

除此之外,目前尚未发现“尤川”用于他处。据此推测,尤川也仅是尤溪的另一种别称。

沈溪说。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等编《朱子全书》颁行全国。李光地编撰时提到:“朱子生于尤溪,故小字沈郎,小字季廷。后人均以朱子字沈郎耳。”

浙江大学教授、朱子学研究大家束景南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在《朱子大传》里说:“尤溪古称沈溪。公元1130年,宋代理学家大成者朱熹诞生于南剑州尤溪水南的郑氏馆舍,其父朱松时任尤溪县尉,他想到枝荣(七发)的‘沈沈沈沈,蒲伏连连’,给他出生于沈溪河畔的季子(朱熹)取小字沈郎,小字季廷。后来人们一直以为朱熹的小名为沈郎,实际上是字误传说。”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外地专家的认可,如倪剑青在《朱熹1194年》一书中就采用此说。

“沈溪”说虽然源自李光地、梁章钜等大家,但有史以来各版县志、府志、省志乃至国家级志书均没有“沈溪”的记载,尤溪本地的文化名人也不认可这一说法。束景南教授认为:“盖沈字僻不多见,宋代刻工好作俗字……后人遂将沈误认为沈。”这种推测难以让人信服,试想,一个县名的县名会因为刻工的错误而将错就错吗?这不太符合常理。

尤溪说。嘉靖六年(1527年)版《尤溪县志》是尤溪目前存世最早的县志资料,载曰:“尤溪,旧名沈溪,后人因避王审知讳,故去水名‘尤’,或云洲多尤姓,故名溪,因以名县,未知孰是。”此后的各版县志,如崇禎、康熙、乾隆、道光、民国等志均采用此说。这也说明明代嘉靖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县名“尤溪”或“沈溪”的混乱现象,并且“未知孰是”,成为历史悬案。

实际上,“沈溪”这一叫法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宋政和年间,朱松在《林文悦诗》中称“尤溪”(县)为“沈溪”:“沈溪者旧半丘墟,犹有期颐隐市区。未展武侯床下拜,已传颜子梦中呼。”朱松有时也称“尤溪”(河)为“沈水”,如在《求道人自尤溪来还冷斋有诗次韵》一诗写道:“五年沈水照衰颜,溪上今谁独往还。身插乱峰随一锡,梦回萧寺绕千间。”

除此之外,称尤溪为“沈溪”的大多散见于各家谱序言或一般性文字之中。如民国郑元植在重修《尤溪县志》中说:“余曩过沈溪,得读《南溪书院志》,悉实贤轶轶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尤溪既是县名,也是闽江支流之一,是当地的母亲河。不论是“尤溪”还是“沈溪”,有时候是县名,有时候是河流,应视内容而定。

尤溪说。“尤溪”是建县之初就一直沿用至今的县名,也已列入联合国地名遗产保护。根据目前所有能查证到的中国历史上地理类志书,有关文字记载均称“尤溪县”,并没有其他名字。

征诸史籍,如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的《通典》记载:“长乐郡,领县八:侯官、福唐、长乐、连江、长溪、古田、尤溪。”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志》、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的《新唐书》、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的《舆地纪胜》等均称“尤溪”。

以上就是目前关于尤溪县名的四种主要说法。那么,“沈溪”之说从何而来呢?

首先与母亲河尤溪有关。据明万历版《延平府志》、明崇禎版《尤溪县志》载:“尤溪洲,县东,洲多尤姓,故名。”尤溪洲即现在的沙洲公园。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尤溪洲(青印溪与湖头溪的冲积洲)是有人居住的,并且主要是尤姓人家。

古代地名的命名中,“地以氏称之”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因为洲上有尤姓人家居住,所以环绕冲积洲的溪流叫尤溪,冲积洲就叫尤溪洲。唐开元年间建县时,“因为县人皆悦此源先号尤溪,因以名县”。尤溪洲一直到民国时还有人居住。据《城关镇志》(1985年编)记载:“1924年五月廿日,洪水暴涨……20余户一百余人住的沙坝(兴政坊)房屋尽漂,淹死男女68人。”

其次与尤姓的来源有关。李李纲《梁溪谷漫录》中说:“系出沈氏,五代王审知据闽,闽人姓沈者,避审音,去水改尤氏。”但是尤姓还有其他来源,如《后汉书》就记载了许多尤氏名人,还有源自仇姓,或源自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五代时由于“沈”避讳改姓“尤”,造成了“尤”“沈”两字通用、“尤”“沈”两姓一家的现象。五代之后,甚至还有“尤”“沈”两姓不通婚的规矩。

显然,《尤溪县志》记载“洲多尤姓”的“尤”姓自古有之。尤溪之“尤”与王审知无关,因为唐开元建县时就称“尤溪”,而王审知入闽时间为唐光启元年(885年),彼时尤溪已建县140多年。所以,“沈溪说”认为尤溪原为沈溪,因避王审知讳而改尤溪,这一说法明显存在常识性错误。《八闽通志》《闽大记》均认定:“尤溪尤氏自言其本姓沈,避王审知讳,故改姓尤,非也。”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尤溪,洲多尤姓,故名溪,因以名县。由于王审知入闽,为避王审知讳,沈姓改为尤姓,由此“尤”“沈”一家,“尤溪”亦被称作“沈溪”。

总而言之,千年古县名“尤溪”,别称“沈溪”。(作者单位: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

乡土史记

解读安贞堡门神画

□林洁 文/图



安贞堡一进前门门神:徐茂公和魏征

安贞堡二进前门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

走访永安市槐南镇洋头村的安贞堡,对堡内的两组门神彩绘记忆尤深,它们是堡内建筑装饰中精彩的一部分,展现了当时独特的绘画技法和美学风格。

安贞堡(池潭城)是闽中最大的土堡,坐西朝东,由当地乡绅池占瑞、池云龙父子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建,占地面积8500平方米,建筑面积6700平方米。院内前后有三进,上下两个楼层,建设有正堂和下堂18处,房间共有360余间,是省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大型堡寨。

清代是木板门神画的鼎盛时期,安贞堡下堂厅中间有一道厚实的双扇木门,把下堂格局分隔成前厅和后厅。前厅面对的是前院的天井,后厅正对中心的天井。厅内的大门平时不随便开启,人们都是从左右耳门出入,一走进堡内就能看到两幅木板门神彩画。

一进前门“诸恶退避”,描绘着唐朝威猛的两将——秦叔宝和尉迟恭,手持玉斧,

腰佩鞭弓箭。他们的形象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明代初期开始出现。

门神彩绘常见于寺庙宗祠,不同的地方因为祀神不同,门神的绘像也不尽相同,比如妈祖庙多绘制千里眼、顺风耳或是宫娥侍女;佛教寺庙多绘制哼哈二将、四大天王或是韦驮、伽蓝等图像;宗祠寺庙通常绘制秦叔宝、尉迟敬德等武将。中国门神常见于门、墓室、石窟、陶瓷、木板雕刻,是当时社会风貌的写真。

由于安贞堡内两位门神彩绘的脸部造型在“文革”时期被严重破坏,只能从画面的设色与比例造型中看出两位大将身材魁梧、黝黑粗犷。据史书描述,秦琼面容和善,尉迟恭面容威武,身披铠甲龙鳞淡黄袍,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腰束紧扣。安贞堡两位门神的头部肖像刻画较为雷同,可以推测两者脸部形象及色调大体相近,包括服饰及动作都以对称安排设计。

二进前门“加官晋爵”,描绘着徐茂公和魏征的画像。左手边的门神徐茂公,左手举着托盘,托盘上放置着一个爵。在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中,谐音表意的经典图示常将爵位和酒器联系在一起。右手边的门神魏征,左手托着象牙笏板,右手举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顶精致的官帽。帽子古称“冠”,谐音“官”,酒壶称为“爵”,寓意“加官晋爵”,明清时期较为流行。

两组门神彩绘都以对称的形式展现,脸对脸,在人物动态、构图安排以及色彩处理上追求对称,显示出强烈的装饰意味;目前仍然保留较为完整的绘画面貌,构图画面充实饱满,留白比例少,没有经过后天人为的修饰修缮或者添加现代的色彩元素与符号。在福建众多的堡寨和古厝的门神彩绘中,大部分因为经过后天的描画处理或者请画师进行崭新的绘制工作,使得门神的形象和色彩丧失了原本庄严肃穆且雅致的设色效果,画面鲜艳油腻,门神的表情与五官夸张且非主流。

门神画的绘制需要经过勾勒、填色、沥粉、贴金等数十道复杂工序。彩绘颜料选取天然的植物或者矿物质原料,例如银朱、松烟、石膏、藤黄、雄黄、赭石、朱砂等色彩原料,画面的色彩自然温润,历久不褪色。用适当的胶水调和作画,比例如果掌握不当,会导致画面的色彩起皮脱落。

在精准的人物造型的轮廓线起稿后,将糊状的色浆沿着轮廓线条将其拉长,在门面形成凸起的效果,赋予门神立体感。门神画最为关键的是画面的精神气韵和人物风采展示,许多现代画师由于片面地追求门神画的比例而忽视了人物的神态和精神气质,而安贞堡这两组门神仿佛自带威严,将民俗艺术的精髓展示得淋漓尽致。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